

也活不下去。孔老二、林彪鼓吹“天命论”、“天才论”，目的是复辟旧制度，让劳动人民永远受他们奴役驱使。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的反动思想还在散发臭气，腐蚀人们的思想。我们工人一定要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决批透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肃清其流毒，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伟大任务。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永保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狠批“天命论”，肃清它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流毒

安徽大学 丁心全 徐辅新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为了坚持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竭力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他胡说什么有一个主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的“天”，叫嚷要“畏天命”，企图使奴隶们永远安于奴隶地位，不要触犯奴隶主的统治。孔丘的这一套“天命论”的说教，成为历代反动派搞复辟和维护反动统治的理论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要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拣起了孔丘的“天命论”，大肆鼓吹“天才论”，以此作为他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

孔丘、林彪的“天命论”、“天才论”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很大，流毒甚广，必须彻底批判。

一、林彪鼓吹“天才论”，宣扬自然科学是“上智”头脑的产物

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而一切唯心论的先验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孔丘吹嘘自己是“天生德于予”的“圣人”。林彪学着孔丘的腔调，自吹为“天马”，胡说什么“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是“爹妈给的”，和工人、农民“有天壤之别”。林彪的“天才论”也在对待自然科学发展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他叫嚷，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要靠天生的“灵感”，靠“脑袋特别灵”。似乎有几个“脑袋特别灵”的“天才”，灵机一动就可以“自由”地创造出科学技术来。什么“牛顿看到一只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门捷列夫玩纸牌，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科学的发展是由科学家的欲望决定的”等说法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反映。

自然科学真的是靠“上智”头脑的“灵感”、“欲望”发生、发展的吗？不是！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

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人们在变革自然界的生产实践的斗争中，逐渐地接触到自然界的各个方面和各种现象，逐步地认识自然物的属性，了解现象间的相互关系，发现自然界的各种规律，从而产生了自然科学。社会生产实践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进一步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大量经验材料，提出了新的课题，推动人们去作新的探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生产实践又是检验自然科学的试金石。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所获得的自然科学知识，又必须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检验。每一个科学技术的重大成果，都是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循环往复才完成的。它们决不是任何个人“灵感”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也决不是科学家主观的欲望所能产生的。一个闭目塞听、不亲身参加社会实践的人，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科学知识。“生而知之”的“圣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列子·汤问》篇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孔丘东游，见两小孩辩论。一个说，东西离人愈远看起来就愈小，太阳初出时大如车盖，中午时则如盘盂，因而太阳早晨离人近，中午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反对说，热的东西离人愈远则热的程度愈减弱，太阳是早晨凉，中午热，因而太阳早晨离人远，中午离人近。二人争执不下，便拦住孔丘的车子，要他回答谁是谁非。这位“大圣人”被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两个小孩一边笑，一边指着孔丘说：“孰谓尔多知乎？”这样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却难倒了“孔圣人”，这难道不是对“天命论”的无情嘲弄吗？所谓“生而知之”的“大成至圣先师”，原来是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草包。至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也帮不了孔丘、林彪“天命论”、“天才论”的忙。它也是人类长期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总结。欧洲十五世纪以后，航海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在长期地靠辨认星座来导航的过程中，逐步地认识到太阳运行的规律。望远镜发明以后，借助于它观测星空，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资料。在此基础上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其后又经过许多人的努力，特别是生产实践中关于离心力定律的发现和伽利略的科学实验，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础。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过程，有力地戳穿了林彪靠“灵感”发现科学定律的骗人鬼话。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恩格斯关于“**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著名论断。恩格斯在论述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时写道：“**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他在总结欧洲经过“**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的原因时，明确指出：“**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事实也正是这样。那时的欧洲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纺织、钟表制造等对于力学；印染、冶金等对于化学；透镜制造对于物理学，等等，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材料，才出现了真正系统的自然科学。十八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又推动了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进步。解放后我国科学的迅速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科学种田活动，连续十几年农业大丰收，促进了农业科学迅速向前。机械制造、造船、航空、石油开采、水利、电力等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力学不断前进。石

油化工、印染、冶金等使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迅速改观。生产的自动化和无线电通讯的需要,把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自动控制理论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原子能的利用,导致了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放射生物学的建立和发展。同时,现代化的生产提供了大量的精密仪器设备,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完全证明,生产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离开社会生产,侈谈发展科学靠什么天生的“灵感”、科学家的“欲望”,等等,完全是一派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动说教。

二、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劳动人民是科学的主人

谁是自然科学的主人?是少数“天才”、“圣人”、科学家,还是劳动人民?这是一个坚持唯心史观,还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问题。

孔丘拼命宣扬“生而知之”的“上智”支配一切。孟轲疯狂叫嚷:“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林彪继承孔孟的衣钵,毛耻地自我吹捧为“天才”。林彪一伙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顶礼膜拜,胡说什么发展科学“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公然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一笔抹杀劳动人民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主人翁地位,顽固地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难道科学的发展是一靠“个人”、“靠几个人”决定的吗?否!“**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亿万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是自然科学的源泉,劳动群众是自然科学的真正主人。任何一个科学家只能在群众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在亲身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把群众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做出发明和发现。归根结蒂,一切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都是由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所决定的,没有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活动,就不可能有科学家的任何发现和发明。以蒸汽机的发明来看,公元前130年左右,埃及人希罗就曾利用蒸汽的力量来转动一个球体,从那时到瓦特发明近代蒸汽机,共经历了1800多年的历史。直接涉及这一问题的发明者,著名的就有二十多个。尤其是铁匠牛可门发明的汽机,为瓦特发明近代蒸汽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蒸汽机的发明,如果离开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水、火性质的知识,关于冶金方面的技术,关于机械能、热能的性质以及机械传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瓦特的本领再大,蒸汽机也是发明不出来的。我国力学上关于定向爆破的科学技术,也是在劳动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九七三年五月陕西长安县人民在石砭峪水库成功地进行了我国最大的一次定向爆破筑坝工程。这次定向爆破,总装药量为1,594吨,爆破岩石总方量是136万立方米,平均坝体堆高为55.5米。试问,这样巨大规模的工程,这样复杂的科研试验,难道靠一、两个人能完成吗?绝对不能!这一科研项目的完成,给了孔丘、林彪一记响亮的耳光。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劳动群众在冶金、化学等工业生产的实践中积累的关于63种元素的知识,以及前人关于元素分类的初步尝试,门捷列夫就是把纸牌玩烂,也是发现不了元素周期律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许多科学技术的重大成果都是劳动群众创造的。相反,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不管他们怎样自吹为“生而知之”的“天才”,其实都只不过是一伙不会种田,不会做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蠢驴。解放军战士赵普羽和他的战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打开了聋哑“禁区”,让聋哑人喊出“毛主席万岁”这一时代的最强音,把我国的新医学大大发展了一步。复旦大学的蔡祖泉,由于他长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怕

失败和挫折，攻克了电光源科学上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为发展我国的电光源科学作出了贡献。山东蓬莱南王公社团结大队的农民科学家姚士昌，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种花生，经过多次的试验，终于发现花生生长的规律，使该大队的花生由原来亩产二百斤提高到亩产八百多斤。“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的人物成千成万，数不胜数。无数的事实证明：最聪明，最有学问的是那些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孔丘、林彪妄图用“天命论”来欺骗群众，奴役劳动人民，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三、林彪鼓吹“天才论”，竭力把自然科学研究引入修正主义歧途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科学研究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科学研究工作要不要坚决贯彻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这些问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了我们十分肯定的回答。但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则截然相反。林彪用孔丘的“学也，禄在其中”，“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的说教，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驱使人们追逐个人名利，把科学研究的成果攫为私有财产，当作“不患无位”一举成名的阶梯。林彪宣扬孔丘的“生而知之”的谬论，把人们禁锢在院、部、室、所，与世隔绝，关门搞科研，排斥工农兵群众，妄想依靠所谓“天才”、“上智”的“特别灵”的脑袋去想出“科学成果”来。林彪宣扬孔丘的“焉用稼？”诬蔑劳动人民是“下愚”，是“野人”，反对参加生产实践，鼓吹“理论至上”，别有用心地要人们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脱离生产实际，违背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原则。由此不难看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以孔丘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天命论”为理论基础的。这就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极右实质。也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要清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就必须继续深入批判反动的“天命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亿万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深入地批判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影响，批判了它的理论纲领“天才论”。这种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但是，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无产阶级认为大好和热情歌颂的事，资产阶级总认为是大坏而加以恶毒攻击。他们散布什么“今不如昔”的谬论，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在科技领域里出现的新生事物，对于这些谬论，我们必须予以坚决的回击。

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事实正是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已兴起了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一个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在农村，一个以落实农业八字宪法为中心的科学种田活动广泛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大寨大队贫下中农的群众性科学试验已成风气，很多社员搞过深耕、密植、施肥、选种和谷子、玉米、高粱、小麦移苗试验。60%的社员，能够很熟练地掌握这套技术。新技术的普及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创造了条件。在工交战线上，许多厂矿建立了群众性的科研组织，实行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三结合，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广泛开展科研活动，推广了新技术、新工艺，创造了很多新成果，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大庆工人阶级豪迈地说：“油田是个实验室，井井都是观察站，人人都是观察员，技术还家当主人。”他们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专业研究队伍的作用，把专业研究队伍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从油田勘探、开发、建设到原油加工，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同工农

兵相结合,在工厂、农村锻炼成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具有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所有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我国科学事业的进步,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今非昔比!林彪散布“今不如昔”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坚决不答应!

孔丘、林彪的反动“天命论”、“天才论”并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它还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毒害人们的思想。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积极投入当前的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结合实际,狠批林彪、孔丘的反动观点,肃清其流毒,使科学技术事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猛向前!

(上接第 103 页)

- [115] Кусаков, М. М., Мекеницкая, Л. И., Толщина тонких слоев связанной воды, Тр. IV междунар. нефт. конгр., **3** (1956), 261—271.
- [116] Brown, W. O., The mobility of connate water during a water flood, *JPT*, **9**, 7 (July 1957), 190—195.
- [117] Котяхов, Ф. И., Движение мениска двух несмешивающихся жидкостей в капиллярах, Тр. ВНИИ, вып. 2 (1952).
- [118] Goddard, R. R., Fluid dispersion and distribution in porous media using the frequency response method with a radioactive tracer, *SPEJ*, **6**, 2 (June 1966), 143—152
- [119] Francesconi, R., Trevisoi, C., Note on thermodynamics of multicomponent fluid flow through microporous media, *Chem. Engen. Sci.*, **23**, 12 (1968), 1507—1511.
- [120] Scheidegger, A. E., Statistical hydrodynamics in porous media, *J. Appl. Phys.*, **25**, 8 (1954), 994—1001.
- [121] Hubbert, M. K., Darcy's law and the field equations of the flow of underground fluids, *JPT*, **8**, 10 (Oct. 1956), 222—239.
- [122] Минский, Е. М.,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уравнений фильтрацио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ДАН СССР*, **118**, 2 (1958), 255—258.
- [123] Matheron, G., Genèse et Signification Energétique de la loi de Darcy, *Rev. Inst. Franc. Pétrole*, **21**, 11 (1966), 1697—1706.
- [124]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В. Н., Конвективная диффузия в пористых средах, *ПММ*, **23**, 6 (1959), 1042—1050.
- [125] Вайнер, М.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критерии подобия при фильтрации жидкости в однородной пористой среде, *Изв. АН СССР, ОТН, Механ. и машиностр.*, № 5 (1963). 144—148.
- [126] Антал Ласло, Данные для унифицированной теории процессов переноса, *Инженерно-физ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0**, 1 (1966), 60—63.
- [127] Klinkenberg, L. J., The permeability of porous media to liquids and gases, drilling and production practices, *API* (1941), 200—213.